
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合大学

(美) 易社强 曾景忠 符致兴译

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入侵,是那些误入歧途的人为了卑鄙的目的而采取的野蛮行径。纵然卷入这一可耻事件者相信他们所持理由的正当性,灾难性的后果却使他们的如意算盘成了一个笑柄。

因为我们习惯性地从国家民族的角度陈述现代史,故而完全易于将日本领导人的罪过扩及整个日本民族——同时将中国抗战的英雄主义扩及全体中国人民。因此,我们不是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而是按照惯例简单地说成“日本侵略中国”,倒过来则是“中国抵抗侵略”。更仔细地作考察,我们发现,“中国”这个集合名词与“日本”这个概念一样模糊。历史记载表明,有些中国人(领导人与普通人民一样)仅仅是零散地并且半心半意地抵抗日本侵略者,其他一些人全然未作抵抗,另外一些人则还通敌。除坚定的国务活动家、英雄的战士和自我牺牲的平民的事迹之外,我们也发现了怯懦胆小的领导人、不中用的士兵和机会主义民众的证据。除爱国者外,还有卖国贼;除英雄外,还有懦夫;除了无私的、长期忍受痛苦的群众之外,还有投机商、走私者和鸦片贩卖商。

在了解战时中国的真实情景之前,我们必须彻底考察全体居民的各个部分,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专业人员,作家、艺术家、教员和学生。对于举国上下决心御侮,他们在道义上的领导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先从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这个被人广为接受的笼统结论进行考察。凡是注意1898、1915、1928、1931和1935—1937年反日抗议的近代中国研究者都不怀疑,就总体而言,中国的知识分

子,尤其大学、中学的教员和学生,总是处在反对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抗议的最前列。由于“五四”、“一二·九”等学生示威的荣耀,知识分子赢得了“民族良知”的赞誉。

没有谁比日本军国主义者更清晰地了解这些事实:1937年7月29日—30日放肆地摧残南开大学,只是破坏、亵渎和羞辱那些曾经发动过反日运动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无数敌对行动中最嚣张的一次。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报复。

由于北平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古都,由于日本的攻击几乎持续不断地发生在北方,北平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处于抗日救国运动的最前线。当抗战于1937年开始时,北平两个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与天津的南开大学一起南迁,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再迁昆明,定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般简称“联大”。

作为位于与缅甸毗连的云南省省会昆明的战时中国最著名的大学,联大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与战争的关系,尤其是与中缅战场的关系显得更加突出。

从北平到长沙到昆明

中国的大学在抗战中将起什么作用,并不是清晰的。在纷乱的1937年夏天,当卢沟桥事变爆发成一场大战时,北平学术界陷入混乱。许多学者纷纷逃走,一些学者踌躇不定,另外一些学者则决定,无论如何也留下来。最后,南京政府于8月宣布:北大、清华和南开以长沙临时大学的名义搬迁到似乎安全的湖南中心地带。11月,在长沙和衡山(文学院和法学院已迁到那里)开课。

流亡的学者们的安全感是短暂的。12月13日,南京落入日本人之手。伤亡惨重的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拼命抵抗,不惜一切地顶住了来自长沙所在的长江中游中心地带的大量敌人。数量不断增多的、悲惨、可怜、被遗弃的伤兵遍布所有城镇,这是战争临近的证据。人们慌乱不堪,忧虑重重。在阴雨天,他们总是坐在烟熏火燎的闷热房间里,忧虑着战争,思念着他们的家乡和亲人。在妇女宿舍里,一个女孩的抽泣会引发一阵连锁反应,直到房间里每一个人

都泪汪汪的。然而，临时大学的男生们——不是女生——应征加入战勤服务的传言，激起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年轻的男女平权主义者代表团直扑学校的办公室，要求享有为国效劳的同等机会。那正是遭受挫折的时候。

他们在长沙做了些什么呢？当遍地落下炸弹的时候，他们试图坚持下去的目的是什么呢？打回去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初抵长沙时，许多教授都设想过，或早或迟，他们将象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里的公民一样，被动员起来，去打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即便他们不上前线，政府肯定也会为战时生产、教育军队和一般民众而发挥他们的才智。但是，政府没有这样的计划，他们立刻回转到熟悉的备课、教学和判考卷等日常工作中。中年教师可以在钻研学术业务中好好地寻找慰藉。而在1935年12月历史性的示威中，不把救火水龙皮带和大刀当回事的学生爱国者却不是如此。因此，对于这些热心抗日的青年们来说，无动于衷地适应“现实”，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了使“一二·九”传统不灭，他们出版了《火线》三日刊。作者们在该刊提出许多建议，以解决折磨学生界的混乱和痛苦。敌军进入南京五天之后，《火线》发表了署名“黄克”的《一个大学生的自白》，这是作者对他在同学中见到的麻木和自欺情绪的倾诉。黄良心最初是受到新近从北平来的一位教授的责备。他对黄大声疾呼：“谁会想到临大竟有一千多学生！……当欧战时，德国大学的学生全都离开了教室，只有生病和体弱的才留了下来！”黄因这一使人难堪的事例而烦恼，于是就商于另一位教授，那位教授说，1917年宣战时，美国男生大学的校园里空荡荡的。而现在，日本的学生同样也被送往前线。那么，中国的学生怎么还留在课桌旁呢？

学生们起初三三两两，后来成群结队，响应为国服务的号召。左倾分子乘火车去武汉，在那里他们直奔八路军总司令部办事处，为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而与征招人员见面。他们很快走上加入毛在西北队伍的途中。更多的年轻人，依然出于对中央政府不衰减的信任，宁愿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去尽他们的爱国义务。对他们来

说,有大量的军事单位、训练学校和辅助组织,这些机构都急需受教育的人。最有吸引力的机会是到在长江下游浴血战斗过的英雄胡宗南将军手下服务。应征到胡氏的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是受了转业老兵们的刺激。他们说,当地老百姓极端不关心为他们而战的军人,故而,伤员因为缺乏担架员而死在战场。中国指挥官们在当地条件下得不到重要情报,而敌人的间谍在平民百姓中活动却泰然无事。在一个50人组成的服务团中,有三名医生,十名护士,两名漫画画家,一个戏剧艺术专家和大约35名临大学生。这些志愿者的政治范围,从无党派爱国主义者到国民党的忠实信徒,到共产党的渗透分子,一应俱全。

面临着大批学生离开大学的情况,清华校长梅贻琦(长沙临大实际上的校长)匆忙赶赴武汉,他在那里向中央当局请示。在他返回来召集的一次全体会议上,梅告诉学生们,政府希望他们稍安勿躁,坚守课桌,作好准备,为国家日后的复兴作贡献。

但是,随着长沙任由敌人摆布,他们能在哪里找到避难之所呢?中央政府的一些官员提议迁至重庆,大学派出的代表团前往广西,探索在那里办学的可能性。不过,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云南。云南,含义是“云的南面”——它是地处边远的一种生动象征。云南虽然深处西南,但有滇越(昆明—河内)铁路可同外界联系,是与日本距离最远而同香港、上海和西方交往最为方便的理想之地。

然而,西迁的建议并未得到一致的赞同。《火线下三日刊》上署名于之(音)的学生写文章谴责国民党当权者伪善。于回忆起,两年以前,蒋梦麟拒绝听取放弃北平的意见。让他现在也按照同样的“不退缩的精神”行动!难道教育部长陈立夫本人没有推动学生们为抗战而去组织和训练群众?陈肯定不会宽谅一个会使学生与人民分离的计划!迁往云南这一着将贻国民党自己的教育领导人宣布坚持要做的每一件事一个笑柄。然而,即使已经作出了迁移的决定,学生们的责任却是清楚的:

在英雄的“一二·九”历史之后的儿女,是不习惯于退避的。他

们更不惯于怯懦的自私心理——号召其他所有的人去牺牲,但一旦牺牲降临到他们自己头上的时候,就退却和躲藏——那是让人在抗战中作出牺牲而自己坐享其成的心理。他们肯定将打破迁校的幻想!

但是,为时太晚了。临大学生自治会派代表向武汉政府请愿是徒劳的。它发出致蒋介石敦促他将临大留在长沙,为人民作出榜样的一封电报也是徒劳的。临大迁往昆明一事已经定下来了。

1月19日作出了正式决定。五天之后进行考试,第一学期即行结束。在1月27日—2月10日之间,820名学生填写了表格,表示愿去云南。虽然六百多人已经离去,参加抗战,或转入其他学院,或者返乡,但有整整五分之三的学生宣告,准备自己坚持到“云的南面”。

西迁的旅程漫长而艰险。尽管大多数教师,全体女生部分男生搭乘火车去广州,从香港坐船到海防,再乘火车到河内,尔后北上昆明;还是有大约257名学生和11位教师艰苦跋涉68天,穿越一千英里贫困、崎岖的湘西、贵州和滇东到达昆明。他们到那里重新组建学校,这时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

战时学术成就

尽管1937—38年有场提倡按战时需要调整课程的短暂的运动,联大视其自身的任务为,竭尽所能保持战前教学和学术水准,在国家危难时期保存中国文化学术,这个目标是少变动、多维系。但是,战争给学术成果的出产率带来了惨重的损失。

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配备有最新科学仪器的实验室,被丢弃了,被遗失于途中,间或运到的也是零碎片段残缺不全。基本材料,从化学品到书写用纸都难于取得,或者不可能得到。供电不足,灯光昏暗。薪金因通货膨胀而贬值,不得不靠另外兼职来补充,而它侵占了宝贵的科研时间。物质食料的匮乏,使人们体力不支,心智受损。

一生的学术成果可能在日本炸弹的冲击下毁灭,或者在空袭

警报的混乱中轻易丢失。1942年的一天下午,社会学家李树青,在一次空袭后回到他的房间,发现已被窃贼洗劫一空。这次失窃的物品中,有装着他的《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调查报告》20万字手稿的一个黑皮包。为了预防这样的劫难,金岳霖一次躲避空袭时,唯独抱着他的关于认识论的手稿——将近30年工作的成果。当金抵达山里防空洞时,他倍加小心,坐在他的财宝上。不过,这一天日本飞机未曾露面,“解除警报”信号来得迟了,当它最终响起的时候,金疲乏地起来,转回到镇上。突然意识到把他的巨著丢在那里了,他又匆匆忙忙赶回,然而晚了。他的一部总计60—70万字的手稿不见了。在丢失了大约40年之后,他开玩笑地说:“可能有人用它去包花生了。”无奈,金只好又坐下来,从头至尾重新撰写他的手稿。

值得注意的倒不是学术成果的坎坷遭遇,而是许多工作全都在继续。在科研中,最严重的缩减出现在因设备遗失而残缺不全的实验科学中。尽管如此,但仍像李约瑟所说的那样:没有一门学科,它的一些工作不是在凑合的实验室里继续进行的。李约瑟1943年3月访问过昆明,他在总结这次经历时这样写道:

给这个生气勃勃的重要省份的科学研究机构的访问者留下的主要印象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坚持在他们国家边远地区所表现出来的非常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勇气,和他们身处逆境之中所显示的非凡的乐观,甚至是愉悦。

李约瑟的印象是富有意义的,因为,他抵达云南的时间,作为战时科学研究硕果累累的时期已经结束。1938年—1941年间,即在通货膨胀使学校经费贬损和日本对东京湾和缅甸的占领切断了生命攸关的供应补给之前,许多科学家尚有可能从事已在北平开始的工作;甚至于扩展到云南环境适当的新的地区。在战争早期,政府的帮助也易于得到。然而,当李约瑟访问黑龙潭(距离昆明两个小时的路程)研究所的时候,他发现:有良好的车间,但却缺乏资金购置机器;那里薪金是如此之菲薄,以致有水平的技术人员宁可到私人企业去工作。部分地得感谢李约瑟,以他英国文化和科学协

会赴华使团团长的身份设法获得的援助,科学工作才在越来越困难的条件下得以继续,直到战争结束。

与联大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截然相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他们的战时环境下却兴旺发达。尽管与外国同行的出版物断绝了,但比起大多数的学校同仁,他们不那么依赖图书馆、实验室和设备,而且,西南是多种科研的天然实验室。在昆明郊外几英里的乡村,对农民的生活可以进行直接的研究。对于象费孝通那样已经在中国其他地区乡村作过调查研究的人来说,有不断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在昆明市,人们可以研究乡下移民转化为都市劳动力的问题,那是迅速都市化过程中许多问题之一。当然,云南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还为科研另辟蹊径。

将学术研究与为社会服务结合起来,这是社会学家吴泽霖为了适应战时状态而采用的一种方法。在1942年,战争处于最困难时期,日本正威胁着滇西地区,吴设想了一种在为战区附近边境居民需要服务的同时能进行研究的组织。在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清华大学研究院和云南卫生处的帮助下,吴在丽江建立了一个服务站。这个站配备有年轻学者和社会学新近的毕业生,从事医药卫生、国民教育和有关战争的宣传,同时进行社会调查。在墨江县也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单位。

野外考察中心是呈贡镇,位于昆明以东15英里的铁路线上。陈达在该地有他的国情普查研究所,在那里形成了他的著作《近代中国人口普查》(昆明,1943)和《近代中国人口》(芝加哥,1946)。陈的战时学术经历在他的回忆《浪迹十年》(1947)中有扼要概述。他的研究所根据对昆明和呈贡周围一些县份的考察写了大量研究报告和社会调查。

在呈贡以西不远处有燕京—云南社会学研究站,先是由吴文藻指导,后来由费孝通指导。虽然这个站起初附属于云南大学,但它如同一块磁石,吸引着属于费的小组的联大毕业生。在费的指导下,施国亨(1939年毕业)研究昆明一家工厂的劳工问题(《中国进

入机器时代》，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44），张子意（1939年毕业）与费一起进行卢村研究（《世俗的中国》，芝加哥，1945）合作。即使与书结下不解之缘的社会学家潘光旦，虽然他不与呈任何责任一个研究所联系，但他依然是一个积极的作者，出版了两部有关优生学的著作，并在十几种期刊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中有43篇收入在《自由之路》（1946）一书中。

在战时条件下，联大的社会学家们也设法坚持专业活动。1943年2月，陈达、潘光旦、李景汉和吴泽霖向在昆明、重庆、成都同时举行的全国社会学联合会第七届会议提交了论文。另外，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也参与教育部倡导的一个多学科边疆地区研究计划中的部分，其专题研究包括西南边疆社会，汉藏语系调查，中国边境地区地理等。

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是创造性地适应边疆条件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新机构之一。创建于1942年8月的这个研究室，围绕边疆人民的社会、经济、人文地理、语言和习俗开展研究。参与这项工作的研究人员，包括有南开哲学历史系的主任冯文潜、社会学家陶云逵，联大中文系的罗常培、闻一多、游国恩。

该项目设立于战时的危急关头。为拓展云南西南的交通，省政府计划建设一条铁路，从靠近缅甸和老挝边界的佛海（现勐海）到位于滇越铁路一条支线上的石屏。研究室提供新线沿线少数民族群的情况，作为建设时的参考。通过地方著名人士缪云台的妥善斡旋，南开领导人黄钰生和冯文潜订立了合同，在提高其研究能力的同时，允诺南开为省里和抗战服务。因为有冯提供的行政支持，研究室少数积极的年轻干部，顶着艰难的条件，暴露于热带疫病之下，冒着在多疑的国民党官员手中监禁或处决的危险，产生了铁路研究报告和学术专著。它的会刊《边疆人文》，吸纳了遍布中国西南的学者们的投稿。

联大工学院

除了上述几点外,战争丝毫没有改变联大师生对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兴趣。相反,他们自觉地努力维护这所作为高等学府的大学,对周围社会那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敬而远之,甚至超然于战争本身。然而,联大分院之一的工学院并没有与世隔绝。

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工学院根据政府的指示,增设一个新系(航空工程学)和一门新的训练课程(电信专修科),并且充分利用该院的设施,多收一些学生(电机工程学)。在联大,只有工学院开设许多专为满足军事需要的课程,也只有它设有一家完善的研究所和一些适应市外、省外和国外需要的服务机构。由于基本课程同战前的没有什么两样,工程师们还是着重于可以适应国家长期需要的技能训练。因此,担心这种适应战时急需的功利主义训练不能学以致用是没有根据的。

在所有的联大分院中,工学院对抗战以及云南和昆明的现代化做出的贡献最大。虽然效果显得很分散——这里修一个机场,那里建一座水电站,辅导老师帮助改进机床,实习学生为化学工业和纺织工业出力,所有这些成就加起来却有助于云南步入二十世纪。就其战时和战后工业、交通和国防的发展来说,云南应该感谢联大工程师们的恩惠。

日机轰炸

从战争初期起,日本便不管有无重要的军事价值,对许多人口中心滥施轰炸,企图借此威吓居民,瓦解他们的斗志,从而迫使中国政府屈膝投降。像夷平南开大学所显示的那样,学校也是日军袭击的对象。云南省会虽然不如重庆重要,但却是一个容易袭击的目标。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后,昆明随即处于轰炸的范围之内。从1940年夏起,以东京湾边界对面为基地的日本轰炸机,在战斗机护航下可以发动袭击。尽管残存下来的颇有造诣的流亡艺人早已出现昆明街头,当地居民对空袭还是缺乏思想准备。1938年9月28日,第一批敌机来袭,在昆华师范学校——联大租用的设施

之一——投下十枚炸弹，炸死了两名来自天津的学生。

正如陈纳德指出的：“1939年初，日本人开始作出巨大努力，不断轰炸自由中国每一个重要的人口中心，以便挫败中国人的抵抗。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当然是首要目标。但是重庆因浓雾深锁而多少得到保护，阳光普照的昆明却没有这个有利的条件。1939年10月13日，联大刚刚开放其“新校舍”——位于昆明北郊泥土版墙的建筑群，敌机便对联大各种设施投下数以百计的炸弹。师范学院实被夷为平地，许多学生无处栖身。

这次惨祸的第二天，许多班级照常上课，这是对联大赖以对付挑战的决心和适应性的一种赞颂。警报和空袭很快成为战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警报一响，除了宝贵的科学仪器装进大油桶埋入砖坯砌成的实验室地下外，任何不能随身带走的东西只好听天由命。昆明人民没有藏身之处。这个城市几乎没有重庆那样可供人们躲藏的山洞，地下水位使得任何想挖防空壕的尝试都落了空。为了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跑。因此，“跑警报”成了战时昆明的常用语。

警报制度一般容许人们有一段从容疏散的时间。警报有三次：第一是初次发现敌机朝昆明飞来，第二表示敌机已经临近，第三说明敌机快要轰炸。最初的警报一响，居民要收拾点心、读物或想要带走的贵重物品。拉响第二次警报时，他们要离开家门或工作场所。住在城北——联大的设施大都在这里——的人从各个城门蜂拥而出，奔向城外新校舍那边的小山坡。第三次警报响起，凡是未能到达事先看好的安全地带的人，都要及时跳进最近的壕沟。

到了1940年，昆明人只要醒来看到灿烂的阳光射进窗户，他们便知道上午11时敌机大概会飞临头顶。每天一早，有些人甚至不等警报自行只身上山坡。解除警报一般要到下午2时，那些对空袭毫不在乎的学生便趁机坐在阳光下，同朋友聊天，玩牌，读书，或是找个僻静去处同异性朋友窃窃私语。这种生活开始还觉得好玩，然而警报一频，持续的时间一长，学生们便感到腻烦。学生们有时

跑到乡下闲荡,直到午后很晚才回去。这意味着错过了午餐,没有几个学生身上带零用钱向当地农民购买食品。

空袭警报打乱了学校的时间表。从1940—1941学年开始,大学当局调整了授课日,把它同日机来袭的时间错开:上午7时开始上课,10时午餐后,各个单位自行分散直到中午;下午3时恢复上课直至6时。即使如此,也很难像平常那样坚持下来。1940年末的一段时间,上午6时半或7时就早早疏散。有时只好在晚间上课,甚至这时也偶有空袭。对那些一心要把课讲完的教授来说,这种状况是令人沮丧的。有一天,吴晗一早来上历史课,发现他的学生全都上了山坡。他气得不肯上课,经学生代表劝说后才消了气。即使不按吴晗的标准看,这学期的缺课率也是很高的。

空袭对学生造成的麻烦较小。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顶多丢失少许个人财物,或者搬往别的宿舍时感到不便。可是对于在昆明安家的教授,利害关系就非同小可了。在费孝通教授家里,吃完早餐便照例忙于对付空袭的事儿:他的夫人煮好一小锅米饭,留待午后回来加热再吃。上午10时左右警报一响,费夫人赶紧弄灭厨房烟火,家里人每人捆包一个“空袭袋”。随着第二次警报传来,他们立即加入走出文化巷的人群,穿过城墙上一个缺口,走过联大校园和英国式花园,爬上一座小山。由于费夫人身体虚弱,他们一般在山后一片开阔地歇脚,直到最后的警报催促他们在附近的壕沟里躲避为止。警报没有解除时,费教授一家总是同联大和云大的朋友和同事闲谈。费教授有时随身带来一本书,但他无心阅读,总是装出随遇而安的样子,享受温暖的阳光和昆明特有的温和气候带来的柔风。费教授想到,他们很容易成为扫射的目标,但敌机一般在投弹后便离去。所以有个玩笑说,日本人只是为了练习才轰炸昆明。据说在昆明上空飞来飞去,是日本空军士官生毕业典礼的一部分。

1940年10月13日,午后1时刚过,费教授像平常那样,在山脚下同朋友们闲聊。这时有27架银灰色日机从东边飞来,炸弹落得这样近,以致他感到一阵又一阵的冲击波。敌机飞走后,费教授

及其同伴爬上山顶,从这里他们看到一股股巨大的尘埃从市中心升起。当时警报已解除,不祥的消息慢慢地传回来:大学区被击中,新校舍的许多建筑被炸毁……在回家的路上,费夫人越来越焦虑不安。一穿过城墙,她就明白自己的忧虑全有根据。在曾是文化巷所在的一堆堆瓦砾中间,他们找到残存的家园。围墙内每边的屋宇都变为成堆的瓦砾。开了大门进去一看,四小时前还很洁净的小院落,现在像是坍塌的古庙。所有的颜色全被厚厚的灰尘蒙住。满院都是树枝碎片和书报碎屑。窗上的玻璃一片不剩,窗架甩在院里。屋内的东西在原地保持完好,只是上面盖满一英寸厚的尘土。费教授急忙向他的书桌走去,一下子找到留在上面的手稿。他们只损失一个热水瓶。费夫人哭了,费教授则笑,虽然谁也不知为什么。他们接着拂去米饭和一小锅红烧肉上的尘土,坐在院里共进晚餐。

正常的幻觉很快就消失。隔壁院子有人在悲泣。原来那里一位长者是个瘾君子,因为跑不动,其妻子和三个孩子只好陪着他。正在恸哭的是一些亲戚,他们刚刚发现五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尚有其他遇难的消息不断传来。站在街对面门口的一位仆人被炸死。费教授向门外望去,所见使他不禁发呕:街上全是血污和碎尸。他把门关上,回到落满尘土的屋子。夜幕降临,可是没有电。他们点燃一支蜡烛。月光透过窗户和屋顶裂缝照了进来。谁也睡不着觉,屋子已变得面目全非,所有接缝的地方均已松动。房东前来察看受损情况,然而没有钱修理。费夫人临近分娩,再也张罗不了日常疏散的事儿。空袭后的第二天早上,费教授把她送往一位住在城东铁路沿线呈贡的朋友家里,然后在僻远的乡下寻找新的住所。

10月13日的空袭对昆明西北部造成了大破坏,联大和云大都设在那里。在师范学院,男生宿舍被炸平,其他建筑也受损严重。西仓坡的一些屋宇已经消失。清华办公楼——也住着梅贻琦及其一家——的前前后后落下许多炸弹,留守在那儿的两位校工被炸死,但埋在后院防空壕里的清华重要文件却幸存下来。在文林街地区,所有学生餐馆和茶室都遭到严重破坏,云南大学的教室也是如

此。

正当联大进行调整以适应频繁的警报和轰炸之际，战争却以其他的方式临近。人们看中昆明并前来避难，是因为从这里通过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1939年初曾一度开放——可通达境外。可是，随着日本对法国和英国在越南边界上的那些殖民地施加压力，与越南和缅甸接壤反而变得吉凶难卜了。1939年11月11日，日军在广东沿海的北海登陆，并迅速向内地推进，11月24日占领广西西南部的南宁。1940年夏，法国同意日本有权在东京湾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那里是与中国接近的越南最北端。此举不仅使日本人轰炸变得更安全和更方便，也使日本逼近云南的东南边界。

中国正面临新的威胁，即日军占领云南的文化学术中心，这种灾难会使中国西南所有逃难者人心动摇。教育部拟了一个计划，并经行政院批准，下令大约12所院校，包括云南最大的联大和云大，共有1900名员工和7300多名注册学生，迁往安全之地。1941年3月，有半数左右的院校和研究单位遵命行事，其余的或则抵制，拖拖拉拉，或则找不到新址。

就联大而言，场地狭小是他迁的另一个原因。它的教室和宿舍大多是借用昆华中学的，后者已决定搬回原址，而联大新校舍则人满为患。为了使这所不断扩充的大学有个容身之地并保证它的安全，学校当局派了两位教授赶往四川寻找校址，紧接着9月份教务长樊际昌也去寻找。最后，蒋梦麟飞往重庆，同教育部长陈立夫等要员讨论该校的局面。然而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尽管有人含糊糊地保证，四川有多处可以容纳联大5000名师生员工，然而他们又找不到一个可容二三百人的地方。此外据估计，搬迁要花一整年，而且所费不菲。

10月13日那场毁灭性的空袭，以及10月26日至29日连续四天的警报和轰炸，引起了新的危机感。于是学校当局临时作出决定，将学校迁往附近的乡村。但在这个计划尚待实施之际，日军却退出宜宁而威胁云南的东南边界。11月份在没有空袭的情况下度

过。经过再三考虑后，大学的官员们认定，不值得为迁校费心劳神。然而，联大要想保持完整的学年已为时太晚。教育部当局已告知前来报到的学生，要去川南的一个小镇叙永上课。11月，该大学正式认可前述决定，有700余名44级入学新生在叙永度过他们的第一年。

1940年以后，除了1943年春有过短暂的恢复外，陈纳德的“飞虎队”阻遏了日机的空袭，但人们又担心会有地面战争。1942年中期，日军把盟军逐出缅甸，随之难民涌入昆明的街头，不安全感——如果不是恐慌的话——笼罩着联大校园。梅贻琦仍然坚定不移，宣布联大留在昆明。

联大学生积极地回应日本人的挑衅。空袭破坏他们的校园，打乱他们的时间表，也迫使他们四出活动，激发青年人特有的积极精神。在抗战期间，爱国主义情绪曾驱动学生走上北平街头，在1935年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中抗议日本的侵略；现在，这种情绪又激励他们在昆明街头行动起来。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学生们积极扩大反日宣传，谴责汪精卫通敌求和，唤起滇中城乡人民支持抗战。学生们通过墙报、传单、小册子和活报剧，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更多的是为抗战演戏筹款。体重不足和营养不良的学生则自愿献血。

然而，对那些更为关心如何完成学业和活下去问题的学生来说，这些活动还是次要的。通货膨胀使得本已捉襟见肘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而政府助学金却赶不上这种飞涨的通货膨胀，学生们觉得简单地活下去的问题越来越重地压在心头。时间花到有报酬的工作上，也就无暇顾及那些爱国活动了。

军 训

在学院生活中，学生们仍置身于战争之外。除了工学院有显著的不同外，联大的课程内容与战前的没有什么差别。军训是战前课程的一部分，1928年以来它就是中国大学的一门必修课。但从一开始，该科目便受到许多矛盾问题的困扰。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这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校内军训与某种姑息政策同时存在。此外，负责

训练的军事教官不如学生有文化,这使文人更瞧不起大兵。而教官一般来自陆军黄埔系,这伙人则把中国的大学视为自由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享乐主义和自由思想的温床。

从1935年开始,校内军训辅以军训夏令营,这种做法在昆明仍在坚持。在1938—1939年学年之前,那儿的学生都有两个多月的训练,女生也第一次被选去参加。她们以哄骗其长官擅自放假和不肯听从“德国秃小子”的指挥而出了名。一些男生则对野营训练表示蔑视。沈从文教授为此写了“一封给青年朋友”的信,提请受训学生注意当前的民族危机同早期的军阀混战有着本质的区别。沈宣称,为抗战受训是一种光荣,而不是耻辱。

根据中央政府统一的新课程规定,军训是所有男生毕业必备的条件。一年级学生每周要上半天不计学分的课程。由于学生免除兵役是政府的政策,他们认为军训没有什么明显的用处,同教官发生摩擦是常见的事。“那些少爷兵真难伺候”,一位男校友回忆说。教官对不叠被子之类的违纪小事可以视而不见,但对其他嘲弄纪律和傲慢地不听命令的事情决不轻易放过。

至少有两名任性的年轻人为此付出了代价。1939年,陈志让因升旗和军训时还未起床而失去奖学金。1938年春,许高原(音),一位主修历史的很有才华的学生,只差两个月便毕业时却遭了殃。他和其他两位同班同学正在教师宿舍一间空房中学习,一位军事教官闯进去宣布,此屋已派做他用,他们必须立即退出。许不习惯于听从这种蛮横无理的命令。(他是个共产党人,据说曾同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争论过。)他的朋友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让他们做完功课才离开。于是他们告诉这位教官,明天起他们才另找活动地方。教官转身就走,向训导处报告这件事。许的两位同伴因不服从一位学校官员的命令被记过两次,许由于是所谓肇事者而被多记一次。在联大,记过三次就要开除:许未领到毕业证便被撵出学校。

学生们对军训十分反感,并非因为它强迫他们接受愚钝的集

训练的军事教官不如学生有文化,这使文人更瞧不起大兵。而教官一般来自陆军黄埔系,这伙人则把中国的大学视为自由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享乐主义和自由思想的温床。

从1935年开始,校内军训辅以军训夏令营,这种做法在昆明仍在坚持。在1938—1939年学年之前,那儿的学生都有两个多月的训练,女生也第一次被选去参加。她们以哄骗其长官擅自放假和不肯听从“德国秃小子”的指挥而出了名。一些男生则对野营训练表示蔑视。沈从文教授为此写了“一封给青年朋友”的信,提请受训学生注意当前的民族危机同早期的军阀混战有着本质的区别。沈宣称,为抗战受训是一种光荣,而不是耻辱。

根据中央政府统一的新课程规定,军训是所有男生毕业必备的条件。一年级学生每周要上半天不计学分的课程。由于学生免除兵役是政府的政策,他们认为军训没有什么明显的用处,同教官发生摩擦是常见的事。“那些少爷兵真难伺候”,一位男校友回忆说。教官对不叠被子之类的违纪小事可以视而不见,但对其他嘲弄纪律和傲慢地不听命令的事情决不轻易放过。

至少有两名任性的年轻人为此付出了代价。1939年,陈志让因升旗和军训时还未起床而失去奖学金。1938年春,许高原(音),一位主修历史的很有才华的学生,只差两个月便毕业时却遭了殃。他和其他两位同班同学正在教师宿舍一间空房中学习,一位军事教官闯进去宣布,此屋已派做他用,他们必须立即退出。许不习惯于听从这种蛮横无理的命令。(他是个共产党人,据说曾同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争论过。)他的朋友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让他们做完功课才离开。于是他们告诉这位教官,明天起他们才另找活动地方。教官转身就走,向训导处报告这件事。许的两位同伴因不服从一位学校官员的命令被记过两次,许由于是所谓肇事者而被多记一次。在联大,记过三次就要开除:许未领到毕业证便被撵出学校。

学生们对军训十分反感,并非因为它强迫他们接受愚钝的集